

每个人包括王磊都应当相信,唯有建设一个成熟、健全的法治社会,社会才永远不会丢掉“共同的良心”。王磊工友们暂时失去的“良心”,必然会被法律寻找回来

“我丢手指,你丢良心”令人震撼

在福建厦门打工的15岁外来童工王磊说,他加班时被机台碾碎4根手指。四个多月过去了,他想认定工伤并找公司索赔时,公司却一口咬定他不是公司员工。王磊说,面对公司的翻脸不认人,他非常气愤,但又很无奈,因为他手上的物证很有限,厂里的30多名工友又无人敢站出来为他作证。

童工王磊的遭遇是弱势群体生存处境的又一真实写照,让人看后百般滋味涌上心头,但更让人震撼的是王磊的一段感言,“他说,他已经丢了4根手指,希望他的工友们不要丢了自己的良心——因为良心是无价的,饭碗丢了可以再找,但良心丢了,你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一句“我丢手指,

你丢良心”击中了社会的道德软肋。

良心是什么?至少,它在这里是指敢于挺身而出、敢于说出事实的真相。在王磊心中,他对于公司老板的良心已经不抱幻想,对于工友们的良心却仍然怀有希望。工友们与他是“一类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相互之间应当惺惺相惜,有理由站出来为他说句良心话。可面对强势的公司老板,王磊的工友们噤若寒蝉。良心呢?

其实,空口议论良心过于单纯了。假如换一种情形,王磊站在自己工友的位置上,看到另一个“王磊”惨遭此事,他会不会挺身而出呢?这不是对王磊的诘问,而是为了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身为社会底层的弱

势群体,无论是王磊还是他的工友们,当自身的安全和工作都难以保障的时候,谈论“良心”的话题就过于沉重了。然而,不谈论“良心”又将如何?

事实上,真正能让王磊欣慰的应该是,良心之外还有法律。据报道,王磊一案已由当地劳动部门介入,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公司举证证明自己的说法——“王磊不是公司的员工”。这就是法律所体现的“社会的良心”,超越了“个体的良心”。每个人包括王磊都应当相信,唯有建设一个成熟、健全的法治社会,社会才永远不会丢掉“共同的良心”。王磊工友们暂时失去的“良心”,必然会被法律寻找回来。 中国青年报(宣华华)

每年都有学生被迫从名校退出,拔苗助长让孩子不堪重负

家长“名校情结”孩子日渐忧郁

新闻晨报 家长赵先生至今仍陷在对自己当初所作选择的悔恨之中——使出浑身解数让孩子进了名校,孩子最终却因跟不上学习进度而患上忧郁症,如今休学在家。

赵先生不会想到,当初让儿子成功进入这所市东北片数一数二的名校后会演变成今天这样的结果。3年前,赵先生使出浑身解数让儿子读上了这所学校,就是希望凭借学校的高升学率让孩子考上理想的大学。但是,良好的愿望和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赵先生渐渐发现,孩子读书越来越吃力,成绩垫底不说,性情也变得十分忧郁,常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终于,在升入高三前,孩子因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不得不办理休学。

“现在想来,一定是孩子的压力太大了。”着手准备为孩子治病的赵先生懊悔不已,“当初就是希望孩子能进一所好学校,现在真的非常后悔把孩子送进去。”“若是在普通中学就读,这名学生的成绩可以排在中等以上,但他父亲‘拔苗助长’送错了学校,实在可惜了。”该校的一名老师说。

一位名校校长表示,对一些基础薄弱的学生,入学时学校就会提醒家长孩子今后可能会出现不适应,但是却拗不过家长,最终将孩子送来学校。一位名校老师说,不少硬塞进来的孩子其实未必真能适应重点学校的学习强度和学习压力。其中,心理调节能力强的或许还能学完全部课程,但那些心理素质薄弱的孩子却有可能出现问题。“我们学校各年级每年都有学生中途转学,其中多数是因为跟不上教学进度,有些家长因此将孩子送出了国,还有一些则去了普通学校。”

在本市一所知名高中,近几年来,仅高三年级每年都有学生退出,多则五六名,少则一两名。另外,每年因为成绩不好,为逃避高考去国外求学的学生在各名校一般也有十多人,在个别学校甚至达到二三十人,这一情况一般出现在高二下半学期。

重点学校被视为通向高等学府最重要的“跑道”,任何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在激烈竞争中提前出局。但教育界人士指出,家长必须正确认识到,不是每一名优秀生的成功都可以复制,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往往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失去自我。

所谓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原上外附中英语高级教师胡迦建议学生和家长,在选择一所学校前要先了解一下该校在教学进度和教学目标上的具体设置。家长要懂得去真正赏识子女,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完整人格。(王婧)

沪上中外戏剧交流日益频繁 小语种翻译人才难觅

解放日报 2007 亚洲当代戏剧季正在上海热闹演出,来自多国的当代戏剧给沪上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精彩,但语言障碍也成了困扰组织者的难题。戏剧季的组织者感叹,如今懂行的翻译实在太少,要找一个既有戏剧专业知识,又懂土耳其语或匈牙利语的翻译谈何容易!

在面具形体剧《傻子公寓》剧团里,除了一位会讲英语的土耳其语翻译外,其余剧组人员都不会英语。装台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与土耳其工作人员玩起了形体游戏,连比划带表演地协调沟通。而《海鸥》剧组只有一位随行的匈牙利女孩会讲中文,由于双方工作人员众多,相互之间无法用语言沟通,装台进程被迫延缓。

亚洲当代戏剧季进行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演出团体来到上海,随之而来的翻译难题也越来越突出。高尔基说:“戏剧是最艰巨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不仅是冗长的人名和语速过快,使台词字幕的翻译极其困难,即便是装台拆台,由于翻译对剧场的了解太少,也直接影响了工作效率。现在,能解小语种翻译“燃眉之急”的,是一群活跃在大学校园里的戏剧爱好者。

话剧中心总经理杨绍林介绍,去年上海话剧中心招募演员时,由于加考英语,曾引起不小的争议。杨绍林感慨道,过去,戏剧翻译家人艺术争议,像李健吾不仅创作和改编过剧本,还当过导演和演员。在今天戏剧大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李健吾”涌现出来。(端木复)



图/News cartoon

加油,你就要成功了! 作者 孙宝欣

刘翔上挂历,是表彰还是商业行为

国际田联 12 美元出售挂历,中国田协表示无奈

青年报 又是一年年末,年画挂历的销售也启动了,国际田联也不例外。昨天,他们在官方网站上宣布,“2008 国际田联巨星墙上挂历”开售,其特色就是 12 个月由刘翔在内的 12 位国际巨星“代言”。挂历售价并不昂贵,卖 12 美元。肖像权受到高度保护的刘翔,这次肖像被用于商业用途,也让刘翔团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就当是荣誉了!”

国际田联每年都会出版这种挂历,田管中心副主任冯树勇告诉本报

记者:“好像是自从 2004 年之后,每年的挂历上都有一个月是给刘翔的。”不过,包括冯树勇在内,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本挂历是在国际田联官方网站上出售的,去年的售价是 12 欧元,今年则便宜了一点,卖 12 美元,上面还同时公布了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以及电子邮箱方便联系。但是,包括刘翔在内的这些明星,肖像权其实是不可以用于商业用途的,这种官方挂历却用于出售,连冯树勇都觉得难以界定是否属于违规。(陈宏)

27 岁的黄超曾经也是城管驱赶下“抱头鼠窜”的一个小摊贩,但现在他已经过不了这个梦魔。从 11 月 20 日清晨开始,他走出家门摆摊卖早餐,底气十足。他的安全感来自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街道的一项实践:把解决城市市容需求、百姓就业需求与市民消费需求融合到一个名叫“爱心帮帮车”的项目上。而且跟以前政府大包大揽不同的是,在这个项目上,政府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在广泛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由企业实施运作。

政府官员表示,希望通过此项尝试,为根治城管“顽症”积累经验;社会学家则认为,这项尝试显示了政府运用社会管理的能力,在简单禁止和简单放开之间找到了疏堵结合的平衡点,兼顾了各方利益。

一辆早餐车,兼顾了城市“面子”与群众“肚子”

11 月 20 日清晨,黄超推着他的早餐车开始摆摊,车上早餐种类颇多,有各种面包、粥、糕点和香肠卷、滷饭团、烧卖、糯米鸡等,最贵的 2 元,最便宜的 8 角钱。在长寿路街道,共有 12 辆这样的早餐车,分布在各个居民小区,让居民就近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早餐车经营人员均为就业困难的失业人员,其中包括像黄超这样过去的无证摊贩。

长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欧阳萍介绍说,过去早餐食品脏、乱、差的情况严重威胁市民的身心健康,而无证摊点乱设摊的现象又给城市市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有不少像黄超这样就业困难群体的生计问题无法解决,因此,街道引进上

海奥食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爱心帮帮车”项目,让市民不出小区就能吃到营养、卫生、方便、快捷的早餐食品,而且早餐车不会摆在马路上占道经营,这样同时解决了城市“面子”与群众“肚子”的问题。

上海奥食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裁林大伟介绍说,早餐车及所有设备均是公司免费赠送,公司在整个项目的运作中采取了统一采购、统一食品、统一形象、统一价格、统一配送、统一管理,所销售的食品都是经过层层把关,不用现场加工,中西干点、湿点、牛奶全部采用单个包装,方便居民又符合环保要求,“力

超他们就业,更多是社会帮、企业帮、人人帮的结果,这种帮助,不仅解决他们的人生计问题,也解决了市容管理的难题。”

戚声隆说,早餐车不允许转租,否则立即终止合同。“转租容易导致市场混乱,像一些层层转包的摊位,为了降低成本,什么假冒伪劣的都卖,结果一塌糊涂。”

治理小摊小贩,只能疏堵结合

早餐车项目的实施,让长寿路街道两个部门同时长吁一口气:一是劳动科,一是城管科。

“城管来了!”尖叫声中,小摊小贩或卷包袱,或推小车,慌不择路,水果满地滚,蔬菜踩成泥……如此一幕,曾经在无数城市上演,如今还在许多城市继续。而城市“面子”与百姓“肚子”孰轻孰重的争议,也在日复一日地进行

早餐车模式破解城管困局

争做到二元吃得饱、三元吃得好、四元吃得高兴!”

在“爱心帮帮车”项目中,早餐车经营人员由街道推荐,公司对他们进行面试后,组织他们进行了职业道德培训和操作技术培训。他们每天从早上 6 时 30 分到 9 时 30 分工作三个小时,月基本工资 1200 元,公司还为他们缴纳“三金”及全年的意外保险,采取多劳多得的奖励办法。“我们是市场化运作,跟政府花钱买岗位解决就业不一样,政府提供就业岗位,毕竟范围太小。”上海奥食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戚声隆说,“在我们这个项目中,政府只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像黄

“这是城市市容管理良性互动、可持续运作的举措,可谓一举多得,多方得益。”街道城管科科长宋超林说。他认为以前城管与摊贩的关系是“恶性互动”,无证摊贩整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一方面上级部门要对市容环境进行考核,另一方面就业困难群体又要吃饭——城管工作难做啊!”

早餐车项目在苏堤春晓小区启动,小区旁边是叶家宅路,曾经是城管与摊贩来回拉锯之地。居民叶根发描述说,乱设摊最严重的时候,路上几乎没法走,夜排档每天要开到凌晨三四点钟,喝酒猜拳声、吵闹声吵得附近居民整夜睡不着觉,很

多居民被吵得根本无法开窗,“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因为睡不着觉拨打 110 报警”。

跟居民埋怨相比,在苏堤春晓小区大门前不远处摆摊卖烤红薯的庄凤良则表示:“不让摆摊,叫我们怎么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队员说,要是城管不管,马上有人投诉政府不作为;要是赶这些摊贩走,又有人骂城管野蛮,没有人性,“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挨骂”。

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大中城市对无证摊贩一直实行“堵”的治理方式,“大盖帽”跟“破草帽”打“游击战”的镜头,成为街头一景。城管制度也

饱受诟病,城管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的现象,近年来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而“城管武装到牙齿”“城管配备防刺背心”等新闻,也时有所闻。

疏堵结合,在市容管理与市民谋生之间寻求平衡——宋超林认为,这是早餐车项目中所寓意的城市管理良策。他表示,即使卫生状态不佳,无证摊贩的早餐点也照样吸引了大量市民。一方面,是因为供应早餐的饮食店布点不科学;另一方面,同低收入人群的低水平消费有关,“无证摊贩的出现,其实是供需关系决定的,市民总要吃早餐吧,所以,光靠堵,肯定是堵不住的,只能疏堵结合。”

政府应该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

“像是否允许设摊这样的‘决策’,就应该用听证会这样的方式,让老百姓自己来协商来确定。现在不同群体利益需求不同,呈现一个非常复杂的格局,政府要擅长使用社会管理的手段,起到协调和平衡的作用,不必要样样冲在第一线。”上海大学教授顾骏说,“政府在面临如何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时,不能保护一个群体的利益,而影响另外一个群体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应该用社会管理的办法,动员社会不同力量,让他们相互协调,或者相互妥协,让群众自己去民主解决。”

每一个城市,都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的,有的人希望马路上只有绿树鲜花、香车美女,没有小摊小贩;有的人希望在马路上摆小摊,赚点钱,贴补家用。顾骏多年来研究就业问题,一直呼吁对马路设摊“解禁”。他说,不是小贩难管,而是如何提高城管执法人员乃至政府的管理水平,“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合法权益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是当前政府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

他说,“爱心帮帮车”这个项目实施以后,可能出现一些此前没想到的问题,这需要政府提高管理能力,积极应对适当开放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放开了,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就撒手不管了,比如,在早餐车管理上,城管部门可以退出第一线,但食品卫生部门,反而要冲上第一线。”

新华每日电讯 (肖春飞)